

丛书主编 廖平胜

新世纪·考试·科学·丛书

G 5-29
L72

中国考试发展史

刘海峰

8 8 6 6 8

$$R_{\mu\nu} - \frac{1}{2}g_{\mu\nu}R = 8\pi G T_{\mu\nu}$$

¹ See also the discussion in the previous section.

$\theta_1 = \theta_2 = \theta_3$

26	27	28	29	30	3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31	1	2	3	4	5	6	7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 编

中国古代考试的兴亡

第一章

中国考试的起源

“考试”一词，最早见于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在此之前，“考”与“试”是意义相近的两个概念。当“考”、“试”合为一个词后，其含义便具有了双重性。一是指对官员的考核和试用；二是指对个体掌握具体知识、能力等效果的一种检验、测度和评定。由于第二层含义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言的考试，所以，本书古代部分主要是将考试作为一种考察知识或技能的方法来论述的。

第一节 先秦考试制度的萌芽

考试起源问题，是研究考试的人最先遇到并必须要首先做出回答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但由于历时久远，文献难征，我们对我国早期的考试无从稽考，知之不详。考试到底创始于什么时期？什么地方？由谁来建立？都不大清楚。于是，便形成了许多不同的中国考试起源观。

一、关于考试起源的学说

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实行考试的国家，这在国际学术界已是公认的事实。《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就指出：“尽管中国早在公元前 165 年就已使用书面考试来测验官职候选人，但是任人唯贤制度直到 19 世纪才在西方世界得到广泛的应用。”美国教育测验专家亚尔保德·兰（Albert R. lang）在他的《新法考试》（Modern Methods in Written Examination）中也指出：“远在纪元前 2200 年的时候，中国已有精密的国家考试制度了，其目的在考选官吏。”相比之下，西方在纪元前约 500 年的时候，才有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举行各种定期考试，以测验青年的技能和能量”。可见，中国开创了人类“考试的先例”。孙中山先生在《五权宪法·民权初步》中也指出：“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那么，中国的考试究竟具体起源于何时？对此学术界始终众说纷纭。

推及最早的是，中国考试活动起源于“山顶洞人”时期先民对新生一代的实践性观察和检验，这一观点见诸廖平胜的《论中国考试的起源》一文中。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根据我国考古发现和古代典籍提供的史实，阐述了人类考试活动产生的必备条件及中国考试产生的孕育期、萌芽期和雏形期。他认为万余年前处于晚期智人阶段的山顶洞人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劳动和生产技能，有了部分生产、生活方面的经验性知识积累。出于自身及社会生命持续需要的迫使，在生产和生活的实践过程中，成年男女向新生一代传授工具制造、猎捕、捞鱼、缝制衣物等方面

的经验和技能，也逐步由自然形态的模仿发展成为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并在传授的过程中进行观察、试探、检验，看其是否真正掌握。此种实践性的观察、检验活动，即是中国考试活动的胚胎，或称之为“孕育期”。他还进一步论述了我国原始部落接受男女青年为正式成员时所举行的“冠礼”作为资格考试、教育考试“发端”，以及五帝时代我国帝王甄选之法、属官在职考核之举等作为中国人事选拔考试与在职考核“源头”的历史地位。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原始社会晚期的这些考试活动，都可视为人类考试的胚芽和中国现今考试之源。”^①

在我国，“言必曰尧舜”。尧舜作为我国传说中的“圣王”，一直被看作是中华民族的万源之宗。于是，尧之“试”舜在很多人看来自然就是中国考试的本原。有学者就认为，在原始社会末期“选贤与能”的过程中，先民十分重视对选拔对象进行严格的考察，这样便产生了我国考试制度的萌芽。而产生于这一时期的“禅让制”更是与考试密不可分。所以说，“考试是禅让制时代的必然产物，考试的出现反过来又促进了禅让制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而见诸史籍中的禅让又恰是从尧、舜时期开始的^②。沈兼士也认为，考试制度是我国古代首创的制度，其见于经史的首推《尚书》。如《虞书》载：四岳举鲧治水，帝曰：“异哉！试可乃已。”而四岳举舜嗣位，帝曰：“我其试哉！”及舜历试诸难，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他说：“此实为考试制度之滥觞。”^③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时的“试”还不是现在的

^① 廖平胜：《论中国考试的起源》，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4期。

^② 黄新宪：《中国考试发展史略》，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③ 沈兼士：《中国考试制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版，第1页。

考试，而只是在实践中观察试用^①。也就是说，原始社会末期传说中出现的“考”、“试”，虽然见载于古文献，但它指的是“试职”和“考绩”，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考试，有人断言：“考试不可能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②

西周乃是是我国奴隶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西周所实行的“选士”制度在先秦文献中记载较多。当时的选士已有明确的要求、简单的程序和负责主持考选的各级官员。所以，有学者说：“西周的选士是我国考试制度的萌生阶段。”^③但很多学者认为，“最近似于现代考试的，产生于汉代”^④。或者说“考试可以追溯到汉代”，“西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公元前 165 年）举行的贤良方正科考试，既是我国不定期举行的特科考试的开端，又是我国取士考试的开端，还是我国考试制度的开端。汉文帝既是我国特科考试的创始人，又是我国取士考试的创始人，还是我国考试制度的创始人”^⑤。当然，有学者更倾向于认为“左雄改制以后，考试制度的雏形也就具备了”^⑥。

① 杨学为：《中国需要“科举学”》，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 年第 4 期。

② 李春祥，侯福禄主编：《河南考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 页。

③ 唐群：《科考篇——风云际会考场路》，三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2 页。

④ 杨学为：《中国需要“科举学”》，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 年第 4 期。

⑤ 盛奇秀：《中国古代考试制度》，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第 11 页。

⑥ 沈兼士：《中国考试制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第 4 版，第 1 页。

然而，我国著名考试史研究专家邓嗣禹却在其所著《中国考试制度史》绪论中指出：“考试之旨，首在取士。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于学，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后出于九品中正，唐至明清出于科举，列代相沿，由来远矣。顾所谓学，所谓郡县吏，所谓九品中正，皆属选举。虽间有射策对策，以补选举之不实，而少落第者，不能称为真正考试。唐以后之科举，令士人投牒自进，公同竞争，高低贵贱，一以定之。且普遍施行，垂为永制，沿袭千年而不变，使天下士人共出于一途，斯为考试之极轨。”本此，邓嗣禹的《中国考试制度史》一书“将唐以前之选举时代，列为绪论，俾明考试之根基，由唐至清，方称本论”^①。

由此看来，关于考试起源的理论就有“山顶洞人说”、“尧舜说”、“西周说”、“汉代说”、“隋唐说”等多种观点。我们认为，考试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都有密切的联系。考试体现着社会对其成员资格的要求和认定，大规模社会考试还昭示出社会所需“贤才”的标准，进而成为人才选拔和推进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因而，考试的产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演变过程。考试的发明也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无数代人不懈探索和努力的成果。从现代意义上说，“考试并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对人类实践活动的模仿”^②，考试的产生必须具备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

首先，考试是教育发展的产物。为了维系社会成员的生存与

^① 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国民政府考选委员会 1936 年版，第 1 页。

^② 杨学为：《中国需要“科举学”》，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 年第 4 期。

发展，上古时代的初民，必须将生产知识、技能和生活经验传授给下一代。而为了有效判别新生一代掌握生产技能的熟练程度和接受社会生活经验的实际效果，人类便开始了最初的考试活动。其次，随着知识的积累、语言的产生、文字的出现和人类意识的萌发、思维活动的开展、判断能力的增强，考试就成了一项有目的、有意识、有计划的社会活动。国外的“青年礼”和中国的“成丁礼”、“冠礼”等，都充分表明它们“不只是对少年是否具备成为社会正式成员的条件所进行的一种检验、考核、鉴定，而是对未成熟少年进行的有计划的集中、系统、严格的训练。成年礼不只是一种仪式，而是一个预定的教育过程”^①。在此过程中，对青少年所实施的有目的、有计划、严格的检验和严酷的考验，可以说就是“一种原始的考试制度”^②。特别是为达到合格成员规定的标准所进行的考核和训练，“已经含有心理特质和身体特质的测验在内了”^③。因而，“冠礼”可视为中国广义教育考试正式开始。也就是说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这就是中国考试的最初源头。最后，也就是说“当社会出现了强制性的社会分工，特别是脑体分工之后，出现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时候，当必须从人群中选择出管理人员或其他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员的时候，人类才发明了考试”^④。

如此看来，中国的考试可能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

① 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

② 郭齐家：《中国古代考试制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页。

③ [美]亚尔保德·兰著，浦漪人，黄明宗译：《新法考试》，正中书局1935年版，第1页。

④ 杨学为：《中国需要“科举学”》，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

初期。根据 2000 年 11 月“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公布的《夏商周年表》，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代的始年被确定为公元前 2070 年。这样，应该说，起码在公元前 2070 年前后，作为选拔官吏的考试已经在我国产生。如此，较为准确的中国考试发展史至今就已有四千余年之久。由此可以说，考试是中国的发明，中国是考试的故乡。当然，从远古实行的“冠礼”到西周制度化考试的形成，中国的考试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孕育过程。但由于缺乏相关的文字记载，因此，有关考试的起源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更深刻的理论探讨。如今我们要了解人类最初的考试活动，还只能依靠有关远古的传说和对这些传说的文献记载。

二、有关考试起源的传说

在原始人群时期，人类虽然还没有建立起完备的国家组织，但是有部族领袖的存在。他们是如何产生的呢？根据教育史研究的结果，教育乃是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的，有了人类便有了教育。鉴于考试与教育密不可分，按理说考试也应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出现。但时隔久远，文字未兴，难以考证，流传下来的口碑文字也只有片言只语。但我们还是能从中捕捉到一些人类最初考试的痕迹。

根据古书记载，在远古传说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低，社会之初民普遍未得到开化，其中若有生产技术和能力高于他人之上者，即得到大家的拥戴，成为初民的群众领袖。他们死后，也为后世所崇拜，从而以传说的形式流传记载下来。如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伏羲氏、黄帝等，这些初民社会领袖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其地位之获得不由于武力之征服或夺取，而系出于

群众自然之拥戴。其所以能获得此拥戴之条件，或由体魄坚强过人，能作任重致远之劳动；或由于能力智慧逾常，能致数多质优之生产。前者之体力为异日君王或武人政治发生之胚胎；后者之智力为异日官吏或哲人政治之渊源。总之，初民社会之群众领袖，率系选举而来。中国历史上唐虞揖让，舜禹禅逊之记载，即推选拥戴之别称也。”^①

相传尧是帝喾的儿子，黄帝的第四代孙。在他担任部落联盟首领时，虽然虚心向学，管理有方，能与人民同甘共苦，但正如孟子所言，“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②。特别是治水，乃成为当时之急务。传说尧召集了各部落首领，问谁能治水？众皆曰：“鲧哉！”尧不同意，说鲧负命毁族，不可！但众人说：“异哉！试不可用而已。”于是，尧听取了众人的意见，用鲧治水，结果“九岁，功用不成”。这一传说说明“推举”、“试官”在当时选拔贤能中已经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当尧在位七十载欲择选接班人时，又召集四个部落首领（四岳），要求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为继。四岳都推荐了虞舜，说他自小受继母、父亲和弟弟的虐待，其“父顽、母嚚、弟傲”，他却“不失子道，孝而慈于弟”，享有好名声。尽管如此，尧还是答应“吾其试哉”。于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舜，让自己的九个儿子和舜一起生活，以便作进一步的观察。即所谓“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此后，

^① 张金鉴：《中国文官制度史》，台湾华冈出版有限公司 1977 年第 3 版，第 1 页。

^② 《孟子·滕文公上》。

尧还“试舜五典百官”，其结果是“五典能从”，“百官时序”。又使舜“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最后，“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①，便禅位于舜。可见，经过一系列的观察、试官和考验，舜才取得了部落联盟首领的地位。

承继舜为联盟首领的是禹。禹相传是黄帝的玄孙，颛顼的孙子，鲧的儿子。“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②。他的最大贡献在于制服了水患。当初其父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舜用贤不避仇，改命禹去治水。大禹总结了其父治水的经验教训，改围堵为疏导，率领部众定高山大川，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制服了水患，使天下得以太平。禹的功德和才智终使“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③，禹在天下臣民的拥戴下即天子位。

据此可知，尧舜时用人，“先荐举、次察品德、然后试之”^④。这些虽无更多的真实材料可考，依然是来之于不同的古代传说，其中有较大的后人赋予他们的理想主义色彩，尚不可视为是信史。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原始社会考试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开创了人类考试发展历史的先河。而《尚书》、《史记》等史籍所载，更给我们研究中国早期考试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材料。特别是传说中先贤圣哲们的选才思想和伟大实践，尤给后人

① 《史记·五帝本纪》。

② 《史记·夏本纪》。

③ 《史记·夏本纪》。

④ 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国民政府考选委员会 1936 年版，第 2 页。

以深刻的思想启迪，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三、西周考试制度的记载

夏代是已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代。文字的发明，为学校教育的开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和可靠的手段。此后，夏代、商代和西周都先后创建了学校。《孟子·滕文公上》载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西周的学校教育制度已发展得比较完备。根据《周礼》、《礼记》的记载，当时王都设有国学，“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地方上也按行政区域相应地设立了家塾、党庠、州序和乡校等。在西周，学校既是养士育才的场所，也是选士任官的重要地方。根据《周礼·地官·司徒》所云：“大司徒之职，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即秉授大司徒之命，乡大夫及其属官每三年举行一次大考。考试主要以“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及“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作为内容和标准，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①，进而把乡中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推荐给国王或使用为乡吏，“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

乡学定期实行的考察和推荐，还有为国学选拔贤能之士的任务。《礼记·王制》云：“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即经乡大夫考察选择乡学中的优秀学生，报告于司徒官，司徒再主持考试，被选中者称“选士”，优秀者入国之大学，称“俊士”。凡升于司徒的可免其乡赋，升入

^① 《周礼·地官·乡大夫》。

大学成为“俊士”的可免除本人对国家的劳役。据此可知，“周取士之法，养士于塾与庠序，然后乡老及地方之长，考察其德行道艺，而升诸大学”^①。

在西周，大学也具有选士功能。大学可以择其优秀者以告于王，给与仕进。《礼记·王制》中说：“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不仅如此，西周大学自身也建有一套相对完整的分年考试制度。根据《礼记·学记》所载，西周大学之道是“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由此可知，西周大学每隔一年进行一次考试，并将考试结果分成两个大的阶段，层层递进，不断提高，这充分显示出考试阶段性与连续性统一的思想。这些记载无论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都对后世考试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有深刻影响。

诸侯贡士制度乃是西周选士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岁献之士都要通过考试来定其优劣。研究表明，周天子对诸侯贡士相当重视，不仅规定了诸侯贡士的时间和人数，还制定了相应的奖惩措施。据郑玄考证，西周“三岁而贡士”，“大国三人，次国二人，小国一人”^②。并根据贡士是否及时实施奖惩。大致是“一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有功者赐以衣服弓矢，再赐以秬鬯，三赐以虎贲百人”。相反，“贡士一不适当谓之过，再不适当谓之敖，三不适当谓之诬。一绌以爵，再绌以地，三绌

^① 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国民政府考选委员会 1936 年版，第 5 页。

^② 郑玄：《礼记·射义》注。

而地毕”^①。

天子对贡土质量的优劣还要亲自加以考核，考核的主要内容是“试射”。《礼记·射义》中说：“诸侯岁献贡土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数与于祭而君有庆，数不与于祭而君有让。数有庆而益地，数有让而削地。”西周这种寓德行于道艺之中的考试方式，旨在借助“试射”来检验应试者的道德水平，以彰显一种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正如《礼记·射义》所云：“射者进退周旋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德行立，则无暴乱之祸矣。”是故，“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

其实，射在西周国学和乡学中也是最为重要的学习内容和必考的主要科目。天子的辟雍作为国家的最高学府，实是一座“射宫”，是专门用于教射、比射选士的场所。乡里选举的关键环节是要行“乡射之礼”，以此让乡里的人了解被举荐者，以取得一致的意见。根据《周礼·地官·保氏》所载，当时考核射箭的标准有五条：一曰“白矢”，二曰“参连”，三曰“剡注”，四曰“襄尺”，五曰“井仪”。即分别要求射者：穿透箭靶，露出箭头；第一箭射出后连发三箭；箭中靶的，应羽颈高于箭头；君臣同射，臣必须退后一步；四箭连发，中靶箭应呈“井”字状。以此来检验被试者的臂力、速度、角度、准确性和必要的礼节规范。当然，西周的考试也非常重视检查礼乐、书数及驾车的本领，以尽量使德行考察和道艺考试相结合。但在德行与技能相同的情况下

^① 孔颖达：《礼记正义·射义》。

下，射箭水平的高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何休说“行同而能耦，别之以射，然后爵之”^①。

西周选士重“试射”，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夏、商、周都正当初民进入阶级社会的早期，培养奴隶主贵族子弟娴熟的武艺和选拔为奴隶主服务的骁勇善战的军事人才，是当时社会的迫切要求。射者，作为男子之事，在西周被倍加重视是很自然的。只不过到了西周时期，奴隶制已基本稳固，才逐渐突显了礼乐德行的内容。但这种崇尚武功的风气可以说此后仍长期存在。“合观《周官》、《王制》、《射义》之文，可知古代各地方的贡士，是专讲武艺的”，后来逐渐重视文治，对所取人才就不再以此为限^②。

总之，根据文献所载，以西周为代表的奴隶社会的选士制度，是学校选育、乡举里选、诸侯贡士三位一体的模式，它讲求养士与选士的紧密结合，注重选士与选官的相互衔接，强调德行与道艺的并重。这些都充分表明，西周的考试制度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已相当完备，是我国考试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

第二节 汉代考试的兴起

考试作为一种客观衡量人才优劣的尺度，其实是在汉代左雄改革察举制的过程中才正式形成的。从此，人们便把考试这种专门知识的程式化方式作为认定任官资格的主要手段。汉代设科射策和太学课试等多元考试方式的推行，将我国古代考试制度的发

①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

② 沈兼士：《中国考试制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第 4 版，第 5 页。

展带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汉代考试是我国考试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

一、汉代考试的兴起

西周时的乡举里选虽然很盛行，但仅限于作为士、府吏和胥徒等的选拔，大夫以上仍是世袭，并不在选举之列。周室东迁进入春秋时期后，世卿世禄的局面继续维持。但随着诸侯争雄，战乱频繁，各国开始竞相起用新兴的士阶层来处理国事。“学而优则仕”的贤才观念也逐步为人们所接受，布衣卿相首开先例，官爵世袭制度开始有所松动。

及至战国，群雄并起，争霸天下，人才遂成为国之大柄。恰此时，游士遍天下，各诸侯竞相延纳，此时“布衣卿相，盛极一时，楚才晋用，蔚成风气，秦王以客卿而成帝业，四公子以养士而致伟功，则其时所以荐举人才，当亦各有其道。惟其事乃因势制宜之特殊运用，乃应变之措施，非定型之制度，殆不过‘存于一心’之妙述也，不足以言其体系”^①。的确，这时的招贤虽不像后世科举考试那样正规和严格，但储才以备后用，国君、权相纳士也有自己的标准。在选士方式上，或招聘，或保举，或自荐，也都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其义都旨在得贤。

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养士用士制，其中富含着考试的成分。荐举保举是西周乡举里选的延续；游士入仕游说，实为汉代举贤良方正对策之肇始；特别是“将”、“相”分职，则开创了选举文武分途之先例；加之自荐仕途的铺设，又给士人提供了自由

^① 张金鉴：《中国文官制度史》，台湾华冈出版有限公司 1977 年第 3 版，第 40~41 页。